

## 壹、前言

近幾十年來，全球化改變了全球社會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型態，引致工業國家相繼面臨失業、所得分配不均與貧富差距日趨惡化的窘境（Esping-Andersen, 2009; Giddens, 2000; Pierson, 1998; Romano, 2006）。相應地，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，失業貧窮亦困擾著許多人，但主要是原住民族。雖然臺灣原住民族歷經1980年代原住民權利運動及後繼原運的種種努力，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、《原住民族身分法》等法令的相繼實施，原住民族的社會位置確實有改善，且與臺灣各族群間在教育和職業隔離方面也日益減弱，但與主流社會相比，原住民仍沒有改變淪落臺灣社會最弱勢族群的樣貌（黃毅志、章英華，2005；劉千嘉、林季平，2008）。至今，原住民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，處於經濟弱勢和政治無權無位，長期遭到社會的歧視與資源、機會剝奪。在此情形下，造成許多低教育、低技術原住民在就業和生活上仍面臨諸多難題。

再者，即令國內近年來在多元文化理念下對原住民族各方面的訴求和需求，已逐步有善意的政策回應，但實際運作上，政策理念落實之速度似乎相對遲滯，至今尚無法有效縮短「原、漢族群間」各項生活水準之結構性落差（詹宜璋，2003）。依原民會調查，當今原住民家庭與全體家庭平均年所得差距還達2倍以上，且原住民家庭的收入來源結構依賴薪資收入的程度非常重，比重達91.5%，遠高於我國全體家庭73.2%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007）。顯見原住民個人和家庭必須更依賴工作獲取基本維生資源。但近年來因國內不景氣、產業外移和外勞引進，使得原住民在都市的工作機會日減，謀生更困難。以致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，有許多失業原住民回流原鄉尋求有限的生存機會。

我國政府爲了回應原住民的失業問題，近十幾年來陸續在原鄉推出許多相關措施，如提供就業服務、促進就業機會、擴大職業訓練和原鄉產業發展

計畫等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008a）。但從實際執行面看，政策的落實有限，迄今，原鄉內部在教育、產業發展方面的改善有限，短期促進就業和職業訓練成效不彰，外部環境如引進外勞、產業外移等問題仍然存在。目前原鄉的生活機會依然有限，居民仍難安身立命，回鄉者舉步維艱。對此，研究者認為原鄉的發展限制和就業問題，除了亟需政府投入更多對策與資源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政府應轉變夙來「由上而下」且難迎合部落需求的政策制定模式，從而針對個別原鄉部落的實際需求進行了解，並謹慎評估如何適切地結合當地有利資源，以協助原鄉開創具有競爭優勢的地方文化產業和就業型態。

但若要进一步掌握原鄉的就業問題與需求，以及在地產業發展的可行方向，實有必要深入探析在地人的體驗和看法。故而，本論文的主軸即以久居信義鄉的社區菁英為研究對象，並以質性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，希冀藉由在地菁英的主體經驗和詮釋，深入了解原鄉發展困境與回鄉者生活難題之間問題癥結，並依研究所得結果，提供政府規劃原鄉發展政策的思考方向。

## 貳、文獻探討

國內原住民族雖然人口數量一直有增加，但長期以來在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和福利等層面卻依然居於弱勢地位。問題是，這般多面向弱勢及弱勢的累積現象，又會形成社會排除（social exclusion）問題，它勢將直接影響原住民的社會參與，尤其是勞動市場參與的能力和機會。按 Burchardt、Le Grand 與 Piachaud（1999）之意，社會排除是指在社會中，個人無法以該社會的公民資格參與正常活動的情況。意即當社會成員在社會參與、政治參與和經濟活動參與等層面參與不足，或無法參與，即被視為社會排除。

再依 Giddens（1998）說法，社會排除係指那些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社會外，與社會之物質繁榮和文化脫節的社會底層人們。Giddens（2000）繼而